

指文® 战争事典  
WAR STORY 特辑 015

# 倭寇

# 战争全史

梁晓天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 战争事典 特辑 015

# 倭寇战争全史

Wokou~The Complete Chronical of The  
Wars against Japanese Pirates

梁晓天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倭寇战争全史 / 梁晓天著. --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07-0857-2

I. ①倭… II. ①梁… III. ①海盗-历史-研究-亚洲 IV. ①D730.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9006号

# 倭寇战争全史

梁晓天 著

---

策划制作: 指文图书®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mailto: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16

字数: 200 千字

版本: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857-2

定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前言

## おのがき

有人说，自从有了船，就有了海盗。海盗，顾名思义，海洋之上的盗匪。海洋意味着财富和神秘，作为在海洋上活动的海盗，也同时更加的神秘与传奇，甚至带上了奇幻的色彩。在西方，海盗曾主宰了一个时代，维京人的龙头船和斧头加盾牌，贯穿了欧洲的8—11世纪，造就了大名鼎鼎的“维京时代”。而在东方，同样有这样的一群海盗，在东亚历史上，留下了同样的历史名词——“倭寇”。

倭，是表示“身材矮小的人”；倭国，是东亚国家对日本的古称；倭寇，也就是指从日本来的寇匪。虽然一直以来，都有日本学者声称倭寇是对蒙古入侵的报复行为，但其实它早已有之。早在11世纪朝鲜半岛就已经出现了关于倭寇的记载，到了13世纪这些“畏威而不怀德”的海上贼寇就已经形成规模，开始以船只为载具，袭击东亚沿海城市乡镇，抢劫财物并掠夺人口了。

东亚格局的两次巨变，让倭寇从“沿海小麻烦”发展成了“海上大威胁”。第一次是蒙古的崛起。蒙古人的征服，使王氏高丽的武器装备一扫而空，日本岛国也因“蒙古来袭”的威胁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由于蒙古人的轻敌和盲动，日本凭借着台风的助力而幸免于难。日本人由此也催生出了“神国观”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不断自我催眠下，开始不断肆虐军力暗弱的王氏高丽，犯下了屠灭村镇，虐杀婴儿等累累罪行。但随着李氏朝鲜的建立，仅凭朝鲜一国之力就已经肃清了倭寇之乱。期间想试探明帝国的部分倭寇，更是在诸如“望海埚大捷”这样的战斗中被明军杀得几乎片帆不得回。

可惜的是，本该就此消声灭迹的倭寇，在16世纪却又一次迎来了机遇。大航海先驱——葡萄牙人霸占东南亚之后，又妄想着称霸东亚，在被明军所痛击后放弃了直接对抗，开始寻觅“代理人”。于是倭寇又迎来了第二次肆虐的契机。

在获得葡萄牙人的支持与赞助后，倭寇实力和狂想膨胀到了极致。这个混合了东西方贪婪与野心的武装集团，又与江浙乡绅势力相勾结。这些享受到“海禁”红利的乡绅们，为了继续进一步获得走私和海盗之利，不惜自毁长城，构陷曾击败葡萄牙人的能臣良将朱纨、卢镗等人，更甘愿堕落为倭寇集团充当“马前卒”和“带路者”。而外有强援，内有勾结的倭寇集团所面对的却是明代中期有城无防、有官无兵的废弛海防，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最终，荼毒东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乱”爆发了。张经、汤克宽等能臣良将苦战十余年而不能遏制。

但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等新一代名将和军事改革家的崛起，明帝国军队针对倭寇之乱进行了全新军事体制变革以及摧枯拉朽般的反击作战。倭寇，这个古代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武装海盗集团，包括他们狂想和暴行，最终都被彻底清除。

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段传奇般的战争全史。另外，本书还为读者复原了15到16世纪期间东亚的政治格局和军事体系，以及被《剑桥战争史》所称道的明代中期军事革命！

# 目錄

## カタログ

- 004 **第一章：早期倭寇的产生（11 世纪到 13 世纪初）**
- 009 **第二章：蒙古来袭导致的倭寇扩大化（13 世纪中叶到 14 世纪中叶）**  
第一次东征：文永之役  
第二次东征：弘安之役  
御家人的破产与意淫下的狂妄
- 030 **第三章：“恶党”倭寇肆虐高丽（14 世纪中叶到 15 世纪）**  
庚寅以来的倭寇  
只爱美人不管江山的恭愍王  
弑王与政斗的高丽国  
抗倭名将李成桂的崛起  
李氏朝鲜的建立  
攻击对马岛：己亥东征
- 068 **第四章：倭寇对中华帝国的早期试探（14 世纪初到 15 世纪初）**  
明帝国重建朝贡与海防体系  
望海碣大捷
- 082 **第五章：西方殖民者与倭寇的合流（16 世纪）**  
与倭寇无异的西方海盗  
明军痛击船坚炮利的西方海盗

与东、西方海盗勾结的明朝乡绅  
西方殖民者对倭寇的武装  
双屿攻灭战  
中国衣冠之盗的卑劣报复

**129 第六章：嘉靖大倭乱的茶毒：东南绎骚（1552年—1558年）**

虚弱的沿海防务  
西班牙火炮外攻，江南士绅内耗  
明军加强防御  
地利、天时、人和皆不在的明代海防  
倭寇的恐怖袭击战术  
离间计杀徐海  
招安计擒汪直

**199 第七章：嘉靖大倭乱的终结：明帝国的反击（1559年—1564年）**

凭福船，用发熗  
鸳鸯阵，长枪手  
杀敌一千，自损三人  
万里杀倭，戚老虎

**236 第八章：倭寇的余孽（1564年—1625年）**

倭寇流传至东南亚  
林凤的余波  
倭寇的最后狂想

# 第一章

## 早期倭寇的產生

11世紀到13世紀初

一直以来，都有日本有学者声称倭寇是对蒙古入侵的报复行为，想以此来给倭寇穿上一层“合理性”的伪装。但其实倭寇早已有之，最早的倭寇记载甚至出现于蒙古崛起之前。

由于日本孤悬海外，与大陆交通不便，在经济文化上全面落后东亚和东北亚国家和地区。所以在古代日本，有相当多的物资需要从大陆进口，小到铁钉，大到寺庙建筑。其承载经济活动的核心物品——钱币，都要仰仗从中国进口。然而日本又以出产金银铜而闻名。对马银山早在七世纪就已开启。因此，随着日本本土金银矿和铜矿的逐渐开发，到了宋代，将日用品贩卖到日本、甚至直接贩卖铜钱，都可以获得极高的利润。东亚大陆与日本的贸易随之繁盛起来。

如同当年罗马帝国崩溃后，修道院成

为欧洲文化聚集地一样，随着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解体，寺庙成为了日本最高水平的文化聚集地。11世纪中后期以来，“欣求净土，厌离秽土”的佛教信仰开始在日本逐渐兴盛。日本国内对佛经、寺庙建筑的要求越发急迫。随着中日航线在数百年来不断开拓下，安全性大为提高。中日直航不再像以前唐朝时期鉴真东渡一般困难，日本僧侣开始不断来往中日两国。日本密宗僧侣荣西于1168年和1187年两度入宋，在天台山学习中国佛教的坐禅和寺庙建筑。1191年荣西归国后，开始传播禅宗思想，随后禅宗思想开始兴起。1202年，将军源赖家亲自在京都，为日本第一座禅宗寺庙建仁寺开基。随后各地禅宗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1211年，京都泉涌寺开工，41年博多崇福寺和承天寺开工，43年，京都会东福寺开工。“宋风佛教”开始在日本各地兴盛起来，成为镰仓时代日本佛教改革的重要契机。

僧侣们通过与大陆之间的交流，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回日本。随着中国本土佛教流派在日本的兴盛，文化的传播带来了中国产“唐物”的兴起和繁荣。同时代的 中国，北方女真族的兴起，“靖康之耻”后北宋灭亡。赵构在杭州建立了南宋，并将首都从中原迁移至江南。北方战乱，以及政治重心的南移，使江南地区经济急剧发展。为了应对北方女真族的军事入侵，南宋在江淮地区着重发展水军，造船业开始兴盛。随着中国和阿拉伯商人在海上的贸易活跃，通过对海上贸易的船只收税和政府督办，在财政上大大缓解了南宋地方

和中央的经济压力，使得中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变的极其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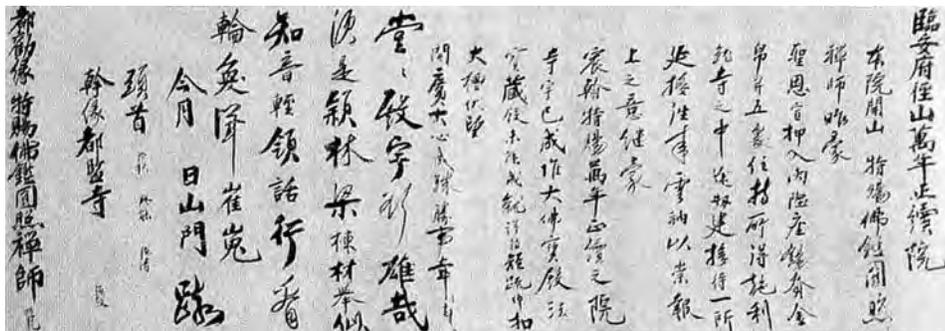
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和造船业的兴盛，过度的砍伐树木，造成南宋东南沿海经济中心附近区域，森林资源开始枯竭。而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又吸引着有着巨大军

费开支的南宋政府。作为南宋首都杭州附近的明州港，其中一条的贸易航线便是直达日本的博多港。而且南宋禅宗的文化中心五山，便是杭州、宁波（明州现属宁波）附近的五座最高级别的山寺禅院。因此当日本入宋僧来到中国的禅宗中心，就会刚好碰上急需资金和军用物资以及木材的南宋商人。于是两国的海上贸易有了极快的增长。日本僧侣坐船携带南宋经济所需要的金银，军事上制造火药所用的硫磺、造船所用木材到南宋明州，学习南宋的禅宗思想，文化技术，带回陶瓷、铜钱等物品回到日本博多，日本也有了最早的唐人街——南宋海商的唐房。与此同时，宋代海商与日本寺院的联系也变得相当紧密，很多商人在日本的合作方便是寺院和僧侣。1242年2月，杭州径山寺院被烧毁，江浙地区缺乏重建所需大型木料，于是无准禅师便通过其日本学生圆尔，从日本购得重建所需一千根巨木后，再通过博多宋商谢国明运送至杭州的。

当时，中日两国贸易额度相当巨大，1298年北条得宗家一条开往中国的船只在五岛列岛沉没。根据古文书的记载，船上装载金、水银、绢布等和少量武具、漆器等工艺品。1976年1月，韩国全罗南道新安冲海底发现了一条巨大的古代沉船。根据数年的发掘，从这条沉船上发掘出土了一万八千六百余件青、白瓷器，铜钱八百万枚，紫檀一千余件。从出土的文物上看，这是一条于1323年沉没的寺社造营料唐船。该船为筹建九州东福、承天等寺的僧侣们在中国福建地区所制造的，由宁



◎ 无准师范（东福寺藏）



◎ 临安府径山万年正续院新建佛殿教藏劝进偈并叙（五岛美术馆藏）

波出发，开往日本，后因风暴而飘没于朝鲜半岛。而当时这条线路上的贸易已经有所衰落，但这条元代寺社造营料唐船，其回程上仍携带了如此巨量的现金和陶瓷器。那么又有多少类似船只运送大量的现金和物资，来往于宋元上百年的贸易路线上便可想而知了。所以说，一开始出现的倭寇，并非所谓因元朝入侵所导致的自发报复行为，纯粹因为中、日、朝三地海上贸易航线中的巨额利润，吸引着日本当地妄图不劳而获的亡命之徒们。

高丽宣宗十年（1093年），高丽（即“王氏高丽”，公元918年立国）水军在延平岛捕获了一条日本“贸易船”，船员31名，宋人十二名，倭人十九名。这是条奇怪的“贸易船”，除了水银、珍珠、硫磺、法螺等物品之外，还有弓箭、刀剑、甲冑。弓箭、刀剑到还罢了，然而历代法律中，禁止民间私藏甲冑，私人持有甲冑可以说等于死罪。既然甲冑并不可能为了贸易，那便是为了自用。

因此，这条非官方的、武装完备到甲冑齐全的“贸易船”，其实就是倭寇船！而

这也就是关于倭寇的最早记载！

捕获这条船的延平岛，距离高丽首都开城却不到80千米。倭寇船在高丽首都沿海活动。意味着，当时日本海寇已经对高丽首都周边沿海海州、延安、礼成、金浦等港口和沿海城市的民间海上贸易、生活构成了极大威胁。

海州和礼成两地，是宋朝使节进入高丽首都的两个泊岸港口。礼成港除开宋朝使节、商人的泊岸地之外，还是大食等国商人和高丽国内漕运的重要船只停靠地。高丽在此地驻派有专门管理国际贸易的官员。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在1012~1278年间，在高丽首都开城附近港口城市登记过的宋朝商人超过了5000名。其中主要集中在11世纪后期，登记的宋朝商人大约为2700名，在这个时间段的海上贸易航线附近，出现这些日本武装海盗集团，也就不足为奇了。经过审讯后，这些身居博多港的归化“宋人”和倭人被高丽流放。

武装船只出现在这些港口城市附近，给了高丽王朝极大的震动。抓到了一条，没抓到的有多少呢？由商人来航数量可以

看出，1081年—1090年，高丽所登记过的宋朝商人有516名。等到发现“武装贸易船”的1093年的1091—1100年间，宋朝商人人数减少到345名。等到1101年—1110年间，减少到219名，到了1111年~1120年，甚至锐减至3名。商人人数的急剧减少，意味着高丽海上贸易环境的严重恶化。由于是甲冑在大陆民间，是根本不可能私人持有的军用物品，而船只所有方和人员均为日本九州。因此，在这类全副武装，刀枪弓箭、甲冑齐全的日本武装“贸易船”中，日本九州地方领主在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便很是耐人寻味了。

有一条这样的日本史料：1226年，日本九州镰仓幕府御家人（平安时代的日本将效忠上级贵族、武将的武士称为“家人”，镰仓幕府时代，将军被尊称为御，效忠将军的武士便被称为“御家人”，将军分封御家人为领主，而御家人为此承担一定经济和军事义务）松浦党，有一条前往中国的船只，在回来的时候，被风吹到高丽，因为跟高丽的恩怨，所以船只被高丽人烧毁了。查找这个时期1121年—1130的来航高丽的宋朝商人，人数是115名，为高丽1171年—1290年近百年间海上贸易的最高峰。

高丽当然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毁坏日本“商船”，那究竟是什么恩怨呢？在这件事的第二年，也就是1227年，不堪倭寇其扰的朝鲜王氏高丽政权使臣到达日本九州，状告去年，也就是1226年日本船只对金州的袭击。高丽使节以关闭贸易为威胁，要求日本方面镇压长期以来活跃在东北亚海

域的“倭寇”。

倭寇，这个专有名词，就这样第一次正式的出现在了史料上。不满足仅仅劫掠商船的日本武装劫掠团伙们，乘着王氏高丽政权的动荡衰落，登上了朝鲜半岛的陆地，开始进攻城镇。因此，之前那条九州松浦党船只的真实身份也就昭然若揭了。

13世纪的倭寇，现存朝鲜史料所载共有十一次。当时那些早期倭寇，战力和规模还远不及后世倭寇。他们肉搏打不过衰落期的高丽军队，海战中船只更是小的可怜。最小的船上只有区区八个人，大点也不过三十余人。这样的小船要想远航中国当然十分困难，由此可见这些人其实是对马、九州等地的沿海豪强。他们无法像镰仓幕府那样购买能载员数百人的中国远洋海船，但又眼红海上贸易利润而无法直接参与，于是直接用小船进行劫掠。然而这种行为本质上也损害了幕府的海上贸易利益，因此这些人在日本被称为“恶徒”。

1223年《高丽史》高宗十年五月“倭寇金州”。这个倭寇，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倭寇。他的念法应该是“倭，寇金州”，其含义为倭人来金州为盗寇。当时的日本朝廷也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新古今和歌集》作者藤原定家在其日记《明月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嘉禄二年（1226年）十月十六日，与法眼和尚的一段谈话。“传闻对马与高丽国进行战争，前所未闻也”。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七日，日记里又出现了这么一条“据说镇西名为松浦党之恶党等，乘数十艘兵船至彼国别岛进行交战，烧民家，掠资财。去者半遭杀戮，余者盗

银器而归，对于朝廷，很是不妙。”日记里同样记载了1226年的那次松浦党船只被焚，人员被杀的事件。藤原定家当时住在京都，也就是说，九州恶党，劫掠邻国，已经传到了京都，给了日本公家极大的震动，“末世狂乱之极，灭亡之根源乎？！”

《明月记》里，在嘉禄二年十二月和安贞元年（1227年）二月，京都两次讨论了九州恶党攻击临国高丽的事件，然而，公家做出了什么结论，因为史料所限，现在我们并不知晓。这两次的讨论，都在安贞元年五月，高丽全罗道按察使使节到来之前。

高丽、日本都不是傻子，两国上下都很清楚这些所谓倭寇究竟是什么。1227年7月21日，关白直庐议事提到“去年对马国恶徒等，向高丽国全罗州，夺取人物，侵袭住民事”。对马、松浦等地，是九州大宰少贰武藤资赖，即后来的少贰家首任当主的管辖范围。自己地盘上出动了规模不小的船队外出作战，连远在京都的公家不久便已知晓并进行过讨论，他本人是绝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说不得还参与其中。

于是，在朝廷还没反应过来前，这位少贰家一代目就当着朝鲜使节的面，处斩了九十余名恶徒。他起草的所谓日本谢罪国书也随高丽使节带回。“谢贼船寇边之罪，仍请修好互市”。高丽使节断绝外贸的威胁，却被持“畏怖=蔑视”理念的武家政权，认为是在歧视日本。

因为在日本的观念中“你敢威胁我？那就是看不起我！”纵使日本虽然不甘，而且高丽也不是中国那样的巨无霸，且处

在衰落期，但是依旧比落后的日本强大。于是日本方面也就只能“我朝之耻也”的干嚎了两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日本的这封国书和口头保证上并没有改变什么。外交承诺如同废纸，贯穿着日本的古今历史。更何况镰仓幕府只是日本各地大小领主的盟主，并不能完全掌控下级领主。镰仓御家人松浦党，在朝鲜使节告完状之后只消停了五年。1232年9月，他们就再一次袭击了朝鲜南部沿岸。1251年，倭寇又攻打金州城等地。除了城镇，粮船也是倭寇的目标。1263年2月，在金州熊神县勿岛，对马的倭寇抢劫了停泊在那里的高丽漕运船。穷困潦倒的日本豪强领主们什么都不放过，抢了漕船的120石米和43匹布之后，临走又把椽岛居民洗劫了。粮食财物自然不说，连高丽平民的身上衣服，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放过，留下一票被扒光了的百姓丢给哭笑不得的高丽官军。“穷山恶水出刁民”，正是此时日本九州最真实的写照。

其实一直到这个时期，倭寇也算不得什么大害。因为在中华帝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政治格局里，不可能有倭寇兴风作浪的空间和机会。但随着蒙古的崛起，东亚的传统军事政治格局被打破了。这就为倭寇的扩大化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同时也使得日本本国大为牟利。这是日本第一次从东亚格局的巨变牟利，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因此从此日本也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静静地等在东亚的角落里，等待着东亚格局巨变的那一天。

# 第二章

## 蒙古來襲導致的倭寇擴大化

(13世紀中葉到14世紀中葉)

13世纪初，蒙古游牧民族在铁木真的带领下，崛起于北方草原。1227年，西夏灭亡。1231年，蒙古军包围高丽首都开京。1234年，金朝灭亡。1260年，高丽开宗投降蒙古。至此，蒙古兵锋直至日本海。

说起蒙古东征日本，那就不能不提朝鲜的崔氏政权。朝鲜历史上的文班、武班两班制度始于高丽时代。由于高丽的文治主义传统，武官地位长期处于文官之下。958年，随着唐朝科举制度的引入朝鲜，朝鲜在文科之外设立了僧侣专用的僧科，同时却拒绝对武官开设武举，武官的选拔只能依靠世袭和战功，朝鲜尚文轻武的风潮自此开启。

12世纪前半期，朝鲜政局动荡。1126年，外戚李资谦之乱爆发，1135年，妖僧清之乱爆发，首都开京被荒废。在此情况下，朝鲜兵权由文班掌控，加剧了武班的不满

情绪。随着1146年毅宗在位，进行佛教仪式之时奢华优待周边文官以及宦官，却对下级武臣进行残酷的役使，武臣的不满达到顶峰。

1170年8月，高丽国王毅宗在普贤院行幸之时，随行的高级武官郑仲夫和下级武官李义方等人调动军队，杀死随行文臣八十名以上，随后攻占首都开京，废除毅宗王位，拥立其弟明宗即位。政治实权从此掌控在武人手中，建立了类似日本幕府的朝鲜武臣政权。

把军人们逼上反路的国王自然是愚蠢的，然而对于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通过造反上位的军人们来说，治国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仅武臣政权的前二十五年，就一口气换了五位当主。除了在位四年就病死的庆大升，其他武臣当主们都是死于下属的“下克上”。这种乱局一直到了“靖国功臣三韩大匡大中大夫上将军柱国”崔忠献时代才得到了终结。

高丽明宗二十六年（1196年），崔忠献把握机会，诛灭操控大权的武臣李义旼，并籍此声威铲除一批廷臣。崔忠献夺得大权后，1197年将明宗退位，选其弟神宗为王。1204年，神宗病故后，崔忠献又连续更换了两任高丽君主。神宗死后，由熙宗王讷继位，但仍受忠献牵制，因而引起拥护王室的官员王涛明等人的不满。王涛明联络僧兵企图伏击崔忠献，但计谋败露，被忠献所灭。之后，忠献废熙宗，1211年立明宗儿子康宗王禛。到1213年，又换了个更听话的高宗。

通过废立君主，崔忠献确立了崔氏的

统治地位，终于结束了武臣政权的动荡局面。在之后的61年，高丽便由崔氏政权统治，另设官府，自行配置僚属，朝政归崔忠献其后裔所掌握。崔忠献至其曾孙崔瑄四代挟王掌政，国王仅保虚位而已。

然而，崔氏政权之所以在朝鲜牢固存在的根本所在，是其牢牢控制着的朝鲜三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左别抄、右别抄和神义军，史称三别抄。然而随着蒙古军队进入朝鲜，三别抄再有战斗力，也并非掌控欧亚大陆的蒙古军队的对手。崔氏幕府的最后一位当主崔瑄在首都沦陷后，仍迁都继续顽强抵抗蒙古的侵略。1258年，崔瑄被高丽投降派文臣柳墩联合其部下金俊杀害。之后高丽元宗入朝，对蒙古称臣。

蒙古的外部压力没有了，高丽的内部斗争又出现了。能压服各军头的将军已经身亡，各路豪强就开始借权力的角逐。金俊很快被部下林衍所杀，但是没两年，林衍得急病身亡。被武人压制了一百年的

文臣趁机重新上位。这些文臣决定，乘着外来蒙古大军之势，把武家政权彻底终结了。

那些文臣的理由是，既然高丽国王都成了蒙古人的臣子，那么武家政权的基础“三别抄”作为反对蒙古人的主力核心，自然是所有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因此，文臣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将高丽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三别抄解散！

1270年，走投无路的三别抄们在其首领裴仲孙的带领下，带着高丽王室成员王温从江华岛突围，逃到了珍岛继续抵抗蒙古侵略者，最终直至全军覆没。但是在文臣政权的把持下，高丽武家政权这支最后的军队，在朝鲜官方一直都是被当作叛逆来看待的。他们英勇抵抗侵略蒙古侵略者的事迹，时至今日仍被称之为“三别抄之乱”。因为，在高丽的文臣们看来，与其把江山交给被自己鄙视了几百年的军人们，还不如跟蒙古人合作！也就是，“宁与鞑虏，不予武夫”！



◎ 宗性笔《蒙古国牒状》（《调伏异朝怨敌抄》所收，东大寺尊胜院所藏）



◎ 北条时政（满愿寺藏）

就这样，因为蒙古人的入侵，朝鲜的崔氏幕府将军，没有能够跟同时代的镰仓幕府一样幸运的存在下来。然而其最后一次垂死挣扎“三别抄之乱”，反而帮镰

仓幕府延缓了蒙古的入侵，并为其提供了足够的预警时间。

当时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一切，如果蒙古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

1268年，忽必烈第二次要求日本臣服的国书由朝鲜递交给日本九州镇西奉行。日本政权此时为北条时政所掌控。日本认为蒙古的国书中言辞相比历代中国国书极为无礼，拒绝了蒙古的要求。在外交失败后，忽必烈已经与五月和十月两次要求高丽进行对日战争准备。

然而此时高丽武人林衍杀死了投降蒙古的金俊，继续在江华岛与蒙古为敌，加之忽必烈将重心转移至南宋，使得此次的战争准备不了了之。虽说军事准备不了了之。然而各方使节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蒙古至元六年（1269年）二月和六月，蒙古继续第三、第四次对日派遣使节。随后高丽三别抄迁移珍岛抵抗。1271年中，蒙古、高丽联军攻打珍岛，三别抄寡不敌众，珍岛失守。三别抄残部退至耽罗（今济州岛）继续顽抗，并派遣使节向日本幕府通告蒙古军队的攻日准备工作，还请求与日本政府联合抵抗蒙古军。三别抄的使节到达不久，蒙古的第五次使节团也抵达日本，同时而来的还有严厉的战争威胁。

## 第一次东征：文永之役

蒙古使节的战争威胁，与三别抄的预警消息相结合，让日本人明白这次蒙古人真的要打过来了。不过，日本对三别抄的

结盟请求采取了日本传统的“默杀”（即不予回应，默然无视）。随后日本的使节团，跟着元人到了大都。

日本的使节团沿着朝鲜半岛，进入元朝首都大都（1271年忽必烈称帝，国号元）。日本使者沿途看到在高丽金州所驻扎的庞大元朝船队和军队。本就想侦查元朝企图的日本人却得到了元朝的安慰，说那是针对三别抄的，只要日本不插手，就没有你们的事。

元至元九年（1272年）四月，日本使节回国。元至元十年三月，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元朝使节抵达日本。四月，蒙古、高丽联合军，乘坐军舰一百六十只，军队一万二千人，攻破济州岛，三别抄残部除极少数人逃至琉球外，其余全军覆没。同年，南宋襄阳城失守，南宋国门洞开，主力尽失，已无继续抵抗能力。至此，元朝远征日本的一切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长期去往日本的元朝使节赵良弼，这样告诉元世祖忽必烈：“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便。”他的意思是，自己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看过日本的风俗习惯，居民好勇斗狠，喜欢用武力解决争端，不孝敬父母，没有上下尊卑的观念。而且日本国内多山地河川，少有平原耕地，就算打下来了，隔着大海，也没法役使当地人，得到了土地也不能创造多少财富。而且军队渡过海洋，不知道风浪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有很大的危害。跨海远征日本，就等于将本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力量，去填无底洞。性价比太低，不

如不打。

赵良弼这样说是有其原因的。当时赵良弼身为正式使节，日本方却不肯让其直接进入本国首都，留置在九州太宰府。按通行国际惯例，这种行为本身是相当无礼的。元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十九日，赵良弼率团（第五次外交团）到达日本。但其实之前的九月十三日，日本京都就已经在讨论朝鲜残余抵抗势力三别抄的要求了。虽然日本“默杀”了三别抄的请求，但幕府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蒙古来袭的战争准备了。当时，执政北条时宗命令东国御家人在九州一带镇压恶党，即不服从幕府方的地方武装势力。完成战场准备之后，元至元九年（1272年），北条时宗设置了“异国警固番役”，以蒙古军队入侵为前提，在筑前、肥前两国以及博多港可登陆的要害地区，调集军队进行军事戒备，由镇西奉行少貳资能、大友赖泰两人为总指挥。

『肥后小代文书』关东御教书「（上包）「北条相模守时宗 北条左京大夫政村」蒙古人可袭来之由、有其闻之间、所差遣御家人等于镇西也、早速自身下向肥后国所领、相伴守护人（名越时章）、且令致异国之防御、且可镇领内之恶党者、依仰执达如件、文永八年九月十三日 相模守（北条时宗）（花押）左京権大夫（北条政村）（花押）小代右卫门尉（重俊）子息等」

赵良弼在九州长期滞留，对日方这些戒备肯定有相当了解。而其作为第六次元朝使节前去日本的元至元十年（1273年），日本渡海禅僧桂堂琼林从南宋回国。前文所提到的杭州径山寺主持虚舟便是其在南



◎ 南浦昭明（兴德寺藏）

宋的师傅。回国前，虚舟将自己的法衣、顶相（宋元之际佛教流行的祖师画像）赠予琼林。南宋是蒙古的敌国，在南宋首都临安府（即今浙江杭州）附近学习的琼林，不可避免的受到宋人对蒙古态度的影响。蒙古人当时的残暴虐杀行为，也是受到佛教禅宗思想所抵制的。琼林归国后作为南宋方的代言人，对幕府方游说，进行反元活动。赵良弼在这种敌对氛围中进行具有蒙古特色的高压外交行为，结果也可想而知。

远公不出虎溪意  
非是陶明谁赏音

欲话个中消息子  
蒲轮何日到云林  
外国高人来日本  
相逢谈笑露真机  
殊方异域无差路  
目击道存更有谁

这是崇福寺主持南浦绍明写给赵良弼的诗。由前文所交代的，崇福寺本身就有很深的南宋禅宗背景，南浦绍明本人也是南宋留学回来的僧侣。赵良弼在大宰府滞留期间，经常与南浦绍明进行诗歌唱和。因此，软硬兼施之下，在当时襄阳还未曾失守，三别抄还在顽抗的背景下，高丽残党三别抄、日本、南宋之间在元朝使节面前的互动，使得赵良弼对忽必烈做出那样的回答，也就不足为奇了。赵良弼的“有用之民力”，在其当时的背景看来，是针对南宋和高丽抵抗组织三别抄的，忽必烈当时也采纳了他的意见。

但在三别抄和南宋相继败亡后，“日本民风剽悍、路途遥远，风险极大”的描述，却成为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的重要诱因。忽必烈的想法是：借着东征日本，把高丽剩余的武人们送去消耗掉，并且在征发船只的时候，还能顺便压榨一下高丽的国力，可谓一举三得。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始东征日本。蒙古的第一次东征，日本人所谓的“文永之役”爆发了。

然而对于习惯了疾如风般骑兵作战的蒙古人来说，海战是个陌生的领域。因此，第一次东征时间显得极为紧迫，准备也相当仓促。于是最后连蒙古人都感到此次船

只不够了。于是这时蒙古人想起了一个高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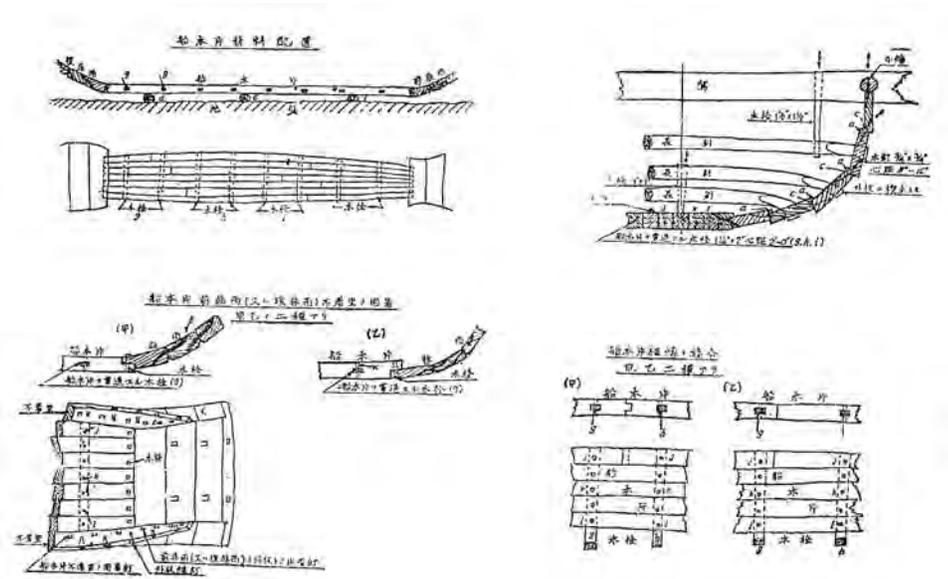
这个高丽人名叫洪茶丘，他的父亲叫洪福源。洪福源本来是高丽北部的守备军人。蒙古人入侵的时候，洪福源投降了蒙古人，后因攻打祖国很卖力，因此做了耽罗军民总管府的管领，管理归附元朝的高丽军民。然而好景不算长，受到蒙哥汗重用的高丽宗室永宁公王綽，因不满洪福源欺辱高丽朝廷的行为，与高丽朝廷合谋，通过其蒙古王族的妻子，把这个为蒙古卖命远比为祖国积极的朝鲜人斩首了。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世袭了其父官职的洪茶丘，自然对高丽政权百般刁难。例如元至元九年（1272年）七月，有日本船停靠到了朝鲜的金州。虽然此时高丽和日本还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是气氛已然很紧张。庆尚道安抚使曹子一怕洪茶丘借

题发挥，便让日本船离开了。可惜怕什么就来什么，很快，这事就被洪茶丘知道了。于是曹子一被洪茶丘逮捕，想拷问出“高丽和日本勾结的证据”。曹子一倒是颇有骨气，严刑拷问之下也没有承认本就没有的“高丽和日本勾结”。高丽遣使张晔，为曹子一鸣冤。洪茶丘看看事不可为，既然这次报复高丽朝廷不成，就拿曹子一当了替罪羊，于是曹子一就被洪茶丘所处罚。

这件事情，让蒙古人觉得让洪茶丘去压榨高丽人一定有效率。于是，洪茶丘被任命为了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在元至元十一年五月蒙古东征军到达之前，洪茶丘已经用以极高的效率，从祖国榨出了三百条大船，六百条小船，一共九百条军舰！

在这么短的时间造了这么多的军舰，对高丽而言是极大的负担。高丽所言“民甚苦之”，同时因为高丽的技术水平和工



◎ 韩国西海地方渔船各部构造（水产试验场 渔船调查报告第二册）